

評山田美香，《日本植民地・占領下の少年犯罪
——台湾を中心に》

東京：成文堂，2013，186 頁

林政佑*

本書作者山田美香現為名古屋市立大學人類文化研究科教授。她的早期研究側重於探討東北亞教育制度的建立；其後以二次大戰以前日本統治下各殖民地的少年犯罪為研究課題，發表多篇關於東北亞各國教育以及少年犯罪的教育史論文，範圍遍及臺灣、中國、香港及朝鮮等地。本書乃收錄作者過去發表的文章而成，以教育史的觀點探討和比較日本帝國統治下少年的犯罪與刑罰等議題。

目前臺灣史學界有關日本統治時期犯罪與刑罰的研究，主要著重於特定法律制度的建置及該法律制度對於臺灣社會產生的影響。但隨著研究討論的深化，逐漸產生新的問題：如果將犯罪與刑罰相關法律制度的繼受移植過程，置於共時性的日本帝國視野中思考，在特定犯罪與刑罰制度的議題上，臺灣與日本本土，乃至與朝鮮或滿洲國之間又有何異同？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本書可以回應上述重要問題，作者以前人鮮少論及的日本殖民地之少年犯罪與刑罰為起點，擴及朝鮮等其他殖民地，從「比較殖民地」

*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生

的視野探討少年犯罪與刑罰等社會現象，開拓出一個值得嘗試的研究方向。

本書除前言和結論之外，共分為九章。由於日本學界對於戰前少年司法的相關討論不足，也未重視日本式少年司法對於殖民地的影響，作者於前言即指出研究戰前少年犯罪的必要。另一方面，殖民地史研究者對於少年犯罪的研究與殖民主義的理念或政策仍關注不多。作者認為，少年犯問題也捲入殖民統治的現代化歷程，進而改變少年的生活型態與樣貌。目前臺灣的相關研究僅有王珮瑩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不良少年」的誕生〉，可見此議題仍待開發。

本書第一章旨在探究戰前亞洲的少年犯罪史與日本少年福祉的歷史關連。尤其是臺灣與朝鮮的戰時體制如何受到日本式少年司法的影響。作者首先比較 1932 年九一八事變以後的戰爭時期，朝鮮與中國東北的少年犯罪統計數據，指出 1936 至 1940 年間，每一年朝鮮潛在的不良少年人數，遠多於日本內地少年審判所受理的人數。其次分析臺灣、朝鮮和關東州的感化院等各項少年司法制度與機構設施之成立過程與差異，¹例如少年審判所與保護處分制度僅在朝鮮與關東州實施，其餘殖民地均無設置。最後指出殖民地的人力與經濟資源較日本內地不足，影響少年司法制度的落差；以及九一八事變後，集體主義社會氛圍興起，造成日本內地與殖民地少年司法制度和實際運作染上了戰爭色彩。

第二章主要討論日治時期日本人如何理解臺灣的少年犯罪，尤其當戰爭逐漸激化時；殖民地如何實施皇民化教育、防止青少年變成不良少年以及犯罪防治等政策。作者以《臺灣司法保護》雜誌為主要材

¹ 感化院是指從社會工作的角度出發的機構設施，用來收容非行少年或不良少年，提供相關資源與教育，改善少年的品行，以利少年未來可以復歸社會。

料，討論以總督府為首的日本官僚、保護團體和婦人保護會等群體眼中的臺灣少年圖像。作者先指出當時少年犯罪成因的討論多著眼於犯罪者家庭環境、個性、交友關係，未著墨少年犯罪與殖民統治的關係。而在有關少年犯罪成因的討論中，日本官僚、保護團體及婦人保護會不乏帶著殖民者的優越感，看待臺灣的犯罪少年或犯罪人，例如認為臺灣人對於犯罪一事沒有罪惡感的刻板印象，將其刻畫為本島人的民族性，由此襯托日本人作為統治者的優越地位。其後，探討公學校教育、警察系統、司法保護團體等如何防止不良少年的發生，不過這些系統之間缺乏彼此橫向的連結，造成改革的困境。最後指出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如何影響預防少年犯罪的措施。

第三章著眼於日治時期臺灣的少年犯罪預防措施，作者先提到過去較為缺乏從教育史的觀點討論殖民地少年犯罪的研究，因此欲補充這方面的不足。作者以《臺中州教育》、《方面時報》等雜誌為主要史料，探討 1930 年代公學校如何指導在學的「問題兒童」。作者介紹臺灣人與公學校的關係，接著描述學校教育與預防少年犯罪的關係，其中提到公學校多數欠缺完善的教育環境、公學校的日本教員對臺灣人家庭的關心與管理呈現消極心態。儘管當時日本內地的犯罪學也重視環境因素，惟在具體作為上，公部門卻未積極地介入和採取行動。最後分析 1930 年代開始的實學教育，認為公學校以日本精神來涵養臺灣少年的品德，希冀達成國民教育的目的。整體而言，日治時期不良少年的處理是以警察為主，犯罪預防則以司法保護團體為中心。但學校則缺乏與地方團體、警察等組織相互聯繫。

第四章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為主要史料，聚焦在日治時期臺灣少年刑務所的教育。作者先簡介日治時期臺灣刑務所的歷史，再討論 1926 年新竹少年刑務所的設置。首先指出，收容的多數少年是臺灣男性以及竊盜犯的初犯，刑期多為一年左右者。其次，討論少年

刑務所內的刑務作業、教育內容和受刑人的健康狀態等，顯示少年刑務所的特色，例如：少年刑務所實施累進處遇制，因應少年受刑人刑務作業的表現來改變待遇的寬嚴，如果刑務作業表現好，將給予少年受刑人徽章和增加飯菜；除此之外，少年刑務所提供受刑人接受公學校程度的教育，令人驚訝的是，少年刑務所授課時數與學校的授課時數相當。最後討論在戰時體制下，皇國思想如何影響少年刑務所教育的形式與內容。

第五章討論日治時期臺灣感化院和教養保護的歷史。日治初期，佛教徒設置臺北感化保護院，除了收容不良少年，也包含出獄的成人，其目的除了殖民地傳教外，也希望收容人與更生人能夠成為良民，復歸社會。該院營運的費用，多由佛教寺院提供。此外，依照規定，原先十四歲以上的少年犯應該由懲治場收容，然而，1907年日本新刑法廢除懲治場以及1908年《感化院法》等法律修正之契機，設置少年感化院更具有迫切性。不良少年進入各感化院，由偏向社會工作性質的機構設施來收容和處置。因此，1909年真宗本願寺的紫雲玄範(1862-1933)推動成立成德學院以收容不良少年，成為殖民地社會事業活動的一環。作者進而分析成德學院的內部規則以及實際的運作情形。從史料中可看出當時社會大眾和實務工作者不太清楚感化院的設置宗旨，例如有人將感化院誤解為監獄。另外，作者也分析感化院職員的經歷與背景，指出感化院職員多半是有學校教育經驗者或曾從事社會事業者。最後說明日治時期臺灣感化教育不發達的理由：一、少年監獄收容的人數遠高於感化院收容人數，感化院制度對社會影響力過低；二、總督府不重視感化院設置，不像日本內地有許多的感化教育機關；三、臺灣的感化院幾乎由佛教把持，其他的宗教能夠置喙的空間非常有限。

第六章探討臺灣少年犯罪的刑罰、日治時期臺灣少年刑務所的行

刑教育。²作者介紹日本內地監獄官練習所的組成和變遷，殖民地的練習生可以經過總督府派遣，到日本監獄官練習所修習。接著，作者討論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和司獄官練習所的設置和相關規則，透過當時考試題目和教育科目，呈現監獄看守所需要具備的知識。進一步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指出新竹少年刑務所基本上以具有軍隊經驗且通曉臺灣事物的日本人為主來看守，以維持刑務所的內部秩序。作者討論少年刑務所內的教誨事業，特別是教誨種類及教誨師的經歷，顯示本願寺在教誨領域的強大影響力。

第七章討論 1930 年代以後臺灣與朝鮮的少年保護。作者先剖析日本內地司法保護團體的興起，進而探討殖民地的司法保護團體。作者發現殖民地沒有類似日本內地少年保護協會的組織，而是由殖民地總督府法務部保護課監督當地的司法保護協會執行少年保護工作。作者亦指出佛教對於少年保護設施的影響。尤其與臺灣相比，佛教在朝鮮的社會事業更為細緻。最後分別探討臺灣與朝鮮的司法保護制度，以該制度與少年保護的互動為核心，觀察司法保護制度與社會事業制度之間的緊密關係，也可以看到當時因為逐漸進入戰爭時期，戰爭的人力動員影響到司法保護事業的發展。整體而言，殖民地總督府的社會福利功能不足、資源不夠，實際運作多是由監獄看守和相關人員所組成具官方性質的司法保護團體。

第八章作者將焦點轉到中國東北的關東州和滿洲國的少年犯罪。

² 刑務所即「監獄」。日治前期多稱監獄，大正末期為了強化監獄刑罰的教育意義而改稱刑務所，希望改善矯正行刑的品質，見小野義秀，《監獄(刑務所)運営 120 年の歴史——明治・大正・昭和の行刑》(東京：矯正協会，2009)，頁 170-171。1924 年開始，臺灣的「監獄」改稱「刑務所」，「支監」改稱「支所」，見《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3124 號，1923 年 12 月，頁 99。本書評主要依照本書作者的脈絡而用詞，為避免混淆，特加以說明。

日本帝國為維持關東州的秩序，試圖師法臺灣的統治模式，引進保甲制度，並擴大活化警察權力。作者指出關東州作為中國大陸的一部份，與日本、朝鮮和臺灣的情形相比，無法控管人口流入，所以控制犯罪的手段有所不同。加上關東州沒有施行司法保護制度，所以多仰賴主導社會救助的「方面委員」³及民間社會事業團體，結合警察機關，以維持少年保護事業的運作；再加上關東州的人民包含不熟悉日本法律的滿洲國人，人口組成極其複雜，因此關東州的警察官多採用有軍旅經驗者。至於少年犯罪實態，以中國少年罪犯為多數，且多是竊盜犯。最後，作者討論滿洲國的少年犯罪，滿洲國犯罪件數非常少，與其保甲制、鄰人監視系統及警察權力運作有關。1936年，於第三回日滿社會事業大會上，與會者看到不少滿洲和日本內地的差異，因此對於日本內地的《少年救護法》或感化院等制度是否適用於滿洲國，意見相左，顯示殖民統治的複雜性。

最後一章，探討日本占領時期香港的不良兒童教育。作者指出在英國統治下基督教會非常活躍，建置了慈善團體、工業學校等機制，以教育不良兒童，但因為後來政治與經濟的混亂，難民流入香港，逐步瓦解原本的社會秩序。1941年日本占領香港，香港總督部仍繼續英國統治時期的孤兒院和工藝學校，沿用過去的網絡和系統教育不良兒童。

作者在本書結論認為明治時期歐美少年保護主義成為管理少年的主要思潮，⁴取代了江戶時期受傳統中國法影響的少年與成人分離

³ 「方面委員」指日治時期在各地方單位中從事社會調查和社會救助工作的第一線工作人員。參見劉晏齊，〈從「救恤」到社會事業——臺灣近代社會福利制度之建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137。

⁴ 少年保護主義指當國家面對犯罪的少年時，不同於採取刑罰的方式來矯正犯罪的成人，反而更加強調對犯罪少年的協助以及引進相關資源來支援少年，促成少年復歸社會，以謀求少年的最佳福祉，參見 Elizabeth S.

主義，並以歐美的少年保護思想建立相關制度。隨著殖民的擴張，日本式少年司法在各殖民地逐漸普及和展開。然而，這種強調統治者的殖民地少年司法，如何調和前述少年保護主義，在當時產生了許多問題。臺灣與朝鮮的少年司法制度雖仿效日本內地，但少年犯罪的實際狀況與日本內地有所不同。儘管隨著後來的內地延長主義，希冀健全殖民地的少年司法制度，可是直到日治終期，以教育手段為主軸的少年犯罪矯治政策仍不受當局重視，殖民地依舊著重於有效率的統治策略，顯示出內地與殖民統治的差異性。不過 1930 年代以後，為了戰爭動員，殖民地與日本內地皆開始醞釀將少年犯送往戰場的策略思考，強調日本精神成為日治後期少年司法的主軸。作者指出當時殖民地少年犯罪的成因分析，受到國際社會思潮的影響，以生物學為主的少年犯罪分析研究逐漸興起，也有從環境因素分析少年犯罪者。並期望未來的研究課題，是探討上述戰前日本式少年司法在戰後的轉變。

綜合上述，筆者嘗試從兩個面向加以探討。第一，從資料使用的觀點檢視本書的歷史解釋與書寫安排之可商榷之處；其次，從犯罪史的角度來檢視本書與相關研究後續發展的可能。

首先，本書使用的資料極為多元，囊括了各個地域、不同類型的相關的史料。不只官方文書，也包含期刊雜誌和時人著作，呈現多樣的少年犯罪圖像，而豐富的資料也可以作為後續研究者按圖索驥的方向。儘管本書的史料運用豐富，但仍有值得檢討之處，並顯示出探討日治時期少年犯罪、刑罰史以及殖民地比較研究的限制與困難。例如，殖民地之間或殖民地與日本內地之間的比較，必須找到共同的比較基準方具說服力。然而本書第一章欲比較戰時體制下的臺灣、朝鮮、中

Scott and Thomas Grisso, "The Evolution of Adolescence: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Juvenile Justice Reform,"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88:1 (Fall 1997): 137.

國東北，卻在論及少年犯罪數時，僅討論日本內地、朝鮮、關東州而獨缺臺灣，未就原設定的三個地域進行比較。

另外，第一章提到日本內地與朝鮮的少年犯罪數的部分，其中朝鮮的統計數字來自《殖民地社會事業關係資料集》。這是當時人訪視感化院後，推估朝鮮整體潛在不良少年的人數；日本內地則是以少年審判所受理的少年人數為斷。儘管作者想比較兩地潛在不良少年的人數，卻未能統一採用少年審判受理人數統計，箇中原因可能在於作者討論的是 1940 年以前，而朝鮮少年審判所直到 1942 年才依《朝鮮少年令》設置，⁵使得作者無法透過對等的材料加以比較。

此外，還有制度上的問題。1933 年日本內地《少年救護法》取代《感化法》，新法主要的規範對象為未滿十四歲的不良少年或潛在的不良少年。依據該法第 8 條規定，地方長官於一定情況下，應將未滿十四歲的不良少年或潛在的不良少年送到少年救護院。所謂的一定情況下除了包含少年審判所的送交之外，如果少年沒有親權人或監護人，或是少年的親權人、監護人提出申請，或是法院的許可等，以上的情形都可能促成地方長官需要將潛在不良少年送到少年教護院。換句話說，姑且不論那些未依本法而受處置的黑數，實際上潛在不良少年人數也遠比少年審判所受理的人數還要多，這些少年可能透過第 8 條所列的其他管道，進入少年救護院等保護機關。不僅如此，1942 年以前日本內地的少年審判所只侷限於幾個地域，普及度非常有限，故以少年審判所的受理人數來捕捉日本內地的潛在不良少年人數，證據稍嫌不足。可見作者以日本內地少年審判所受理的少年人數，來對比朝鮮潛在不良少年人數，比較基準不太一致。

作者在第二章主要討論戰爭時期的臺灣少年犯罪，因此章名應加

⁵ 《朝鮮司法一覽・昭和 18 年版》(京城：朝鮮總督府法務局，1943)，頁 101。

上戰爭時期或日治末期，以限定這一章的討論範圍。另外，作者以《臺灣司法保護》期刊為本章主要史料，筆者以為應該還可搭配總督府犯罪統計或日治法院檔案，從整體的脈絡變化，觀察戰爭時期臺灣少年犯罪現象的特殊性。

第三章的關心議題極具新鮮感，因為教育史的討論較少觸及少年犯罪的議題。透過公學校教育與其他相關制度來討論少年犯罪防治，未來應可繼續發展。但作者在本章提到新竹市「小公學校教護聯盟」，著重於其組織、設立目的以及規則，較少觸及具體實際作為，未來應可繼續延伸探討。

至於第四章先指出 1940 年代前期的犯罪則略顯突兀，究竟為何先討論 1940 年代的犯罪人數與收容人數，而不是先從本章所著重的 1920 年代相關少年刑務所成立時期入手，其內容安排仍可商榷。

此外，本書於序論、第一章與結論皆用到「日本式少年司法」的概念，究竟其具體內涵為何？作者未有進一步地說明。不過，從作者的書寫脈絡觀察，「日本式少年司法」應指進入到日本社會的歐美少年保護主義的少年司法制度，經過繼受與轉化之後，所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少年司法。作者若能就此歸納與說明，勢必更能使讀者了解「日本式少年司法」之意涵。

有別於過去僅關注單一殖民地的研究，近年來，臺灣、日本與韓國研究者倡導帝國史的研究途徑，以比較的角度探討日治時期殖民地的相關研究。該取徑探討複數的殖民地、占領地與日本國內相關制度與社會事實的關連性，了解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特別是殖民地對於殖民母國的影響。帝國史的研究，能跳脫單一殖民地的支配與宰制框架，更清楚地觀察殖民統治的差異與統合。⁶本書的

⁶ 山室信一著，陳姪媛譯，鍾淑敏校，〈國民帝國日本的異法域統合與差別〉，

研究範圍無疑地可以呼應比較殖民地研究的取徑。本書考察少年司法制度的變遷過程不僅止於日本與臺灣，亦包含朝鮮和關東州等殖民地，從中觀察到各殖民地與日本內地之間，制度的設計與施行不同之處。前述第一章提到《少年法》相關制度，為何朝鮮會先實施《少年法》、《少年令》、《感化法》和《少年教護法》，而臺灣相關制度較慢或未實施？第七章提到臺灣與朝鮮的佛教對於社會事業的影響，相較於臺灣，朝鮮佛教所建立的社會事業更為細緻原因為何？第八章論及關東州的少年司法制度，有關東州《少年令》與少年審判所制度，卻沒有實施司法保護制度，也與臺灣極為不同。這些差異的原因為何，亦耐人尋味。以上顯示比較殖民地的少年司法制度之異同，未來仍值得繼續分析。

最後，日本統治時期帶入臺灣許多現代性的制度與事物，因此可從日常社會的多元樣貌與底層人民的生活型態著手，探討在現代性的繼受過程中對於臺灣社會的影響。以歷史觀點探討犯罪，正是一個可以發展的面向，不僅可以看到國家如何控制社會，維持秩序之外，也可以呈現社會底層小人物對國家或社會的反抗或挑戰。在特定的社會中，一個行為或現象不是本質上就被認定為犯罪，犯罪往往來自於社會與歷史的建構，匯聚相關的論述與法律規範，將特定行為標示為犯罪。犯罪史研究試圖揭露國家或社會如何刻畫某種行為成為犯罪，以及分析犯罪者的背景，例如性別、階級等；也探討國家與社會如何控制與論述相關行為，從社會建構的觀點理解犯罪及其文化意義，也能從犯罪的控制權力過程，反省現代性之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不過，相較於西歐或英國犯罪史研究的興盛，現今臺灣學界對犯罪史研究仍較偏重於政治犯罪，其他一般刑事犯罪研究猶待開展。

《臺灣史研究》，16：2（臺北，2009），頁 1-22。

犯罪史研究的途徑大致可以分成三種：⁷一、以統計學的方式觀察犯罪與相關變項的關連性，由此看出犯罪與其他社會事實的相互影響，例如犯罪率與失業率的關係，或犯罪與都市化的關係等。⁸二、從法律與制度面向研究犯罪，像是警察制度、刑事訴訟制度等，探討相關制度與犯罪的關連性；三、由社會史角度著手，探討特定犯罪在社會上呈現的態樣，思索其社會結構以及制度與行動者的互動，由此建構當時人民的社會生活。以上三種途徑並無絕對的優劣之分，毋寧說三種途徑能夠在不同的問題意識下，建立多元的犯罪史研究。本書屬結合前二種途徑，對少年犯罪的社會現象加以描述與詮釋；較少運用第三種途徑，其原因可能來自於資料的限制，也將是日後研究此議題者所需克服的課題。

此外，本書的題目是探討少年犯罪，但「少年」這一概念變動不居，例如菲立普·阿利斯(Philippe Ariès, 1914-1984)曾指出「兒童」的概念在中世紀或更早以前是不存在的。「兒童」從十七世紀以後，作為不同於「成人」的社會群體，開始受到不同的對待；十八世紀以後，兒童的教育和改造變成重要課題，兒童也成為家庭的核心。⁹以此而論，臺灣等東亞國家的「少年」概念是否也有類似或不同於西方的變遷歷程？作者於本書結論中提到，江戶時期日本受傳統中國法影響，已經採取成人與少年分離的方式。姑且不論當時日本或傳統中國法之下有無少年的具體內涵，但從作者的敘述可以明確看到「少年」的概念隨

⁷ 參長谷川貴彦，〈ディルク・ブラジウス著 矢野久 / 矢野裕美訳『歴史のなかの犯罪——日常からのドイツ社会史』〉，《史學雜誌》，99：11(東京，1990)，頁1932-1933。

⁸ 例如古慧雯，〈日治時期臺灣的犯罪統計〉，《經濟論文叢刊》，39：1(臺北，2011)，頁45-79。

⁹ 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trans. Robert Baldick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128-133.

著各項社會條件改變而不同，與歐美國家的脈絡可能也有所區別。如此，不同殖民地的少年司法制度中的少年概念為何？彼此之間又有何異同？各個殖民地的少年司法制度樣貌不同，是否隱含這樣的差異？可見本書對於社會群體的劃分與再建構的分析尚屬有限。¹⁰

總而言之，本書帶給歷史研究者一個新的視野，結合各殖民地的研究與討論，不僅有助於研究者認識日治時期臺灣少年犯罪的歷史，也能從中了解其他殖民地的樣貌，這是本書所最具備開創性之處。

(本文於 2014 年 4 月 21 日收稿；2015 年 4 月 11 日通過刊登)

¹⁰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少年」概念的相關研究，可參見劉晏齊，〈日治時期臺灣法律中的兒童／未成年人——概念的形成及其意義〉，收入劉恆奴、曾文亮、劉晏齊主編，《臺灣法律史的探究及其運用》（臺北：元照出版社，2016），即將出版。